

思想周刊 / 学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学习大家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理论创新

■ 陈甬军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考世界形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等篇目,回应了世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关注问题,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成果。

彰显了胸怀天下的重要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出发而确立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彰显了胸怀天下的重要理念。

“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的“六个必须坚持”之一。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的历史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观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一个典型实践案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伊始,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在这一重要理念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建设迅速启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坚持胸怀天下”更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正确义利观”上。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非洲之际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的重要命题。他在演讲中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正确义利观”重要命题的提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指明了出发点、落脚点与基点,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胸怀天下的重要原则。

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并阐述了多个基本概念,构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这些基本概念主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共建“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公共产品、新型国际合作平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再平衡、软实力等。其中,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

在《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全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的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的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事物,在合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一定能够

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共商共建共享是其重要抓手。共商共建共享的顺利实现需要物质上的供需匹配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十几年前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候,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对发展形成严重障碍。基础设施是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先行资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弥补基础设施短缺沟壑的愿望十分强烈,但是由于产能、资本、技术等方面的长期欠缺,仅凭自身力量建设几乎没有可能。寻求合作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心声。

另一方面,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40多年来,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外需市场培育了中国强大的建设能力,中国不但具备庞大的产能规模优势,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中高端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建设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中国发展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三个供给要素使中国有能力为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献。正是由于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在供给与需求上存在着高度匹配性,中国得以将其相对充裕的生产能力、中高端技术和外汇储备转化为独特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也可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宝贵机遇,通过合作共建有效弥补它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双重缺口,进行本国现代化发展所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与中国共同构成了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目标的供需匹配的条件。这也证明,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是有经济学基础的。

仅有物质上的供需匹配还不足以

全面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为何能取得重大成就。在实践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入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理念革新。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二是目标清晰。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三是方式崭新。通过“五通”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四是路径清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走实走深,实现高质量发展。五是方向明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总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六是愿景动人。努力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以及健康之路、增长之路、减贫之路,等等。其中,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为中国与各国人民一起努力形成一整套合作共建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供了强劲动力,使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这一重要讲话是对坚持胸怀天下理念与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义的重要阐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认识,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

(作者为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理论铸魂·我在之江学新语

■ 徐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员干部要深怀“敬畏之心”。而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在《之江新语》中多次提到蕴含“敬畏”哲学的用语典故,并将其作为党员干部修身用权、履职尽责的核心要求。

《诗经》有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千年警语,道尽中华文明对“敬畏”的刻骨铭心。古人将“敬畏”视为治国安民的主张与道德自律的基石,要求实现“行有所止”的自我约束。

敬畏道德。《礼记》开篇即强调“毋不敬”三字,要求内外兼修;《中庸》中“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体现敬畏之中慎独修身的价值观。宋明理学更将敬畏系统化,程颐强调“涵养须用敬”,指向以敬畏约束心性、规范言行;方孝孺的“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止,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则精辟注解了敬畏对行为规范的奠基作用。

敬畏职责。“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使命在肩、知行合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范仲淹“先忧后乐”,皆因视职责为天授使命。“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敬畏职责。《敬业乐业为美德》中,习近平同志承此脉络,要求“对待本职工作,应常怀敬畏之心,专心、守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

以古训为钥,开时代之门。“敬畏”二字从古至今始终如黄钟大吕,是维系社会伦理与个体操守的强大力量与智慧所在。《之江新语》将“敬畏”二字扩展至发展全局,对传统“敬畏”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引领我们在喧嚣时代寻得精神坐标。

“以祀礼教敬”乃古人教化之枢要,其祭祀天地山川、神灵先祖之仪轨,实为形塑敬畏之心、筑牢伦理秩序之根本。传统敬畏之本是封建伦理下的抽象敬畏,敬畏对象为“天命”“君主”“宗法”等,具有神秘性、等级性和压迫性。而习近平同志在《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中指出:“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所以,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敬畏人民,就是领导干部要对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心生敬畏,既要严谨持重、毫不懈怠地运用权力去为人民谋利益,又要老老实实在、诚诚恳恳地去接受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传统敬畏适用于古代“礼法合一”的人治传统,而《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四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等篇章中所体现的当代敬畏观,是从“畏大人”到“畏法”的突破,重点在于“法纪高于权力”的法治原则,强调权力是责任而非特权。

从“敬天法祖”转化为“敬民守法”,从“忠孝节义”升华为“为党尽责”,“敬畏”二字以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伦理文化为底色,以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灵魂,已深度融入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习近平同志以此为纲,将传统敬畏哲学升华为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执政之基,凸显着“敬畏”哲学的时代回响。新时代,敬畏如何落于行动,行有所止该“止”于何处?

“知畏”正心。首在破除“无知者无畏”的蒙昧,懂敬畏是党员干部在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在日常小事小节中要保持敬畏之心,以约束自身行为,避免因小失大。正如《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中指出的,“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要在格物致知中锚定敬畏边界,为行动划定清晰边界。当然,这种“知”不是模糊的惧怕,也并非束手缚手脚的沉重枷锁,而是对历史规律、法纪规章、民心向背的深刻洞察与自觉遵循,唯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敬畏”破局。敬之深者,畏亦随之,敬畏并非畏缩不前,恰恰是砥砺前行深沉力量,直面考验着干部们的勇毅品格。《之江新语》曾犀利批评“好人主义”的危害,指出“一团和气、好好先生、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不是团结,而是涣散,也是一种麻痹”。新时代的“敬畏”,需以“自断其腕”的勇毅破除积弊,敬畏应当敬畏之事,对诱惑圈猎断然拒绝。最为可贵的“敬畏”,是在“躺平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思潮面前,或是在面对歪风邪气时,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保持初心、坚决斗争、寸步不让。这就要求我们以内在的浩然正气,保持对更高价值与原则的虔诚敬畏。

“行畏”证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畏”是“敬畏”从心间认知走向脚下行动的飞跃。“敬畏”应化为具体行动,将抽象理念转化为推动工作、塑造风尚的实在力量。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领导干部要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之江新语》中就提醒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办事”,倡导“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以及“要甘于做铺垫之事”。

“举头三尺有神明。”说到底,敬畏就是立身、立业、立国的准绳戒尺与德行修养。《之江新语》字里行间流淌的,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诲,亦是对“敬畏”这一精神基石的叩问与重塑。唯有心怀敬畏,我们才能秉持一份清醒的审慎与谦卑的恪守,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准定位,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推叠与人民检验的业绩。

(作者为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重要论述摘编

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2017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古人讲:“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没有敬畏之心,就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干得出来。有的人干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敬畏!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不能在“月黑风高无人见”的自欺欺人中乱了心智,不能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花言巧语中迷了方向,不能在“富贵险中求”的侥幸心理中铤而走险,不能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中恣意妄为。

——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据新华社)

社科论衡

盛世修文，传承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 曾伟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温州大典》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献整理工程,自2021年启动以来,系统梳理温州千年文脉,通过系统性抢救、数字化创新与全球化传播,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挖掘区域文化基因，服务当代社会发展

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温州大典》是温州千年文化的大集成工程,首次系统整合古籍、档案、民间文献,覆盖宋代永嘉学派经典至近代档案珍品,计划十年出版千部典籍。其“大”不仅体现于规模(历代古籍编丛部已出版63部),更在于对城市文脉的全域梳理,将散落全球的温州珍本(如日本藏288种孤本)数字化回归,构建全球共享的文献典藏中心。

《温州大典》的编纂绝非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基因、服务当代社会发展的创新探索。习近平同志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书中指出,浙江自古就有关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伦理总结为“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这些都与发端于温州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理念有相通之处。《温州大典》通过系统梳理宋代至当代的温州文献,首次以典籍实证的方式,揭示了永嘉学派的文化基因如何跨越时空,催生出“温州模式”这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样本。

《温州大典》的编纂也是“强城行动”

的文化基石之一。工程通过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千年脉络,为新时代产业升级、创新创业提供历史镜鉴;通过提炼“敢为人先、包容务实”的温州人精神,为城市品牌注入灵魂,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地方叙事样本。《温州大典》还拟收录近代温州城建、海关、商会、文教等档案,展现百年前“商贾自治、义利共生”的治理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使传统文化从典籍库房走向大众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温州大典》的编纂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实践落地。它通过七编体系的学术架构、跨学科研究范式与全域文献征集,构建了兼具系统性与创新性的编纂模式,更以数字化赋能推动传统文化“活”起来,成为地方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温州大典》以七编体系(历代古籍编、晚近书刊编、文物图像编、档案史料编、民间遗存编、要籍选刊编、专题研究编)构建了温州文化的立体图谱。例如,“历代古籍编”收录了《永嘉丛书》等经典文献,通过原大扫描、双色套印等技术手段,最大程度还原古籍原貌,既保留了文献的原始性,又凸显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精髓。这种分类方式既遵循传统四分法类,又结合温州地域特色,如增设“民间遗存编”和“专题研究编”,体现了对“温州学”研究体系的深化。

编纂过程中,底本搜罗与甄选是首要难题。温州古籍散落于国内外公私藏家,部分文献因年代久远面临虫蛀、酸化等问题。为此,《温州大典》编纂委员会依托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的专业力量,面向国内外公藏机构,开展文献普查与数字化合作。例如,《永嘉丛书》的编校参考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的学术传统,强调文献的“代表性”与“温州特色”,优先收录永嘉学派核心文化元素。编纂团队征集到散落海内外的温州古籍善

本200余种,扫描加工文献80余万册。又如,玉环作为历史上的温州属县,其地方志、先贤著作等被纳入编纂范围,体现了行政区划变迁中的文化连续性。同时,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循“代表性强、温州特色显著、有分量者优先”的甄选标准,确保入典文献的学术价值。

《温州大典》突破传统古籍“重藏轻用”的局限,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文献资源的即时共享与多维呈现。面对古籍“藏”与“用”的矛盾,《温州大典》秉承“修典即建平台”的理念,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实现文献资源的即时共享。例如,《温州大典》通过搭建数字典藏中心,实现古籍资源的云端开放与多端访问。截至2025年3月,数字平台已收录2000余册古籍,支持图文对照、精确检索、繁简转换等功能,用户可通过“浙里办”、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随时随地访问。首批数字化成果《琵琶记》采用结构化数据关联技术,将文字、图像、声像融为一体,既便于研究者利用,又通过短视频、云直播等形式向青少年及海外传播。这种“纸质+数字”的双轨模式,既延续了古籍的物质形态,又拓展了其传播维度,市民可线上追溯族谱家风,海外游子能云端共读乡贤著作,使传统文化从典籍库房走向大众生活。

探寻文化传承的多元路径

《温州大典》的编纂以“学术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工作专班”为核心架构,形成了兼具权威性与创新性的学术共同体与多维人才梯队。学术委员会聘任了3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涵盖历史学、古籍整理、数字技术等领域的顶尖专家。编纂团队则采用“老中青”三代结合模式,形成知识传承与创新突破的动态平衡。此外,温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深度参与,推动文献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融合。建立“本土+外地”智囊团队,联合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开展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等专项合作。整合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文献学等